

早期现代化实践的当代思考

——兼评《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

张翔凤,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征程中,张謇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是一个公认的英雄。但是,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环境的恶劣,以及主体自身的传统文化包袱过重,张謇又不得不扮演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解读《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正是这种“当代史”的需要,要求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历史再度发言。

关键词: 张謇;早期现代化;南通区域

近读严翅君教授《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深为作者关于现代化的理性思考所吸引,产生强烈的共鸣。该书从史学与哲学交融的视角出发,运用了区域史研究的方法,将南通地区视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存在,并与环境进行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这种整体的、动态的观念,把握了南通区域的整体特征,使该书的叙事论史有了全新的角度,视野更为开阔、考察更为入微。本文拟在解读作者在现代化理论上所作贡献的基础上,对早期现代化实践进行当代思考。

迄今为止,现代化始终是人类的一个中心话题。五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实践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不是任何一门单独的学科能够作出回答的。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

来,出现了各学科综合研究现代化的理论趋势。人们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学科的综合研究,确立现代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确立研究的概念工具和逻辑关系,进而建立现代化理论的规范体系。这种努力自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对于现代化研究中的规范体系的寻求,首先必须基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特殊性的思考,包括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殊问题的思考。这样的思考,才会有充分的现实性,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论和抽象概念的演绎,并且能够抓住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主题,在经济、哲学、政治、历史等学科综合的层面上较为中肯地回答现代化所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

《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正是作者本着上述精神所实现的探索:其一,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发展理论与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现代化问题;其二,不是对现代化的一般

收稿日期:2005-09-20

作者简介:张翔凤(1946-),女,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

唐力行(1946-),男,江苏苏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

意义上的研究,而是以张謇的现代化实践为个案,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问题,在这一特殊性研究中找出中国现代化的带规律性的东西。

张謇逝世70多年,而张謇研究早在其逝世前便已开始,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要在理论上超越原有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困难,倘若不能实现超越,那么,这种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作者能够坚持这一选题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时代,理论的综合将会给研究者带来全新的研究视角,必然导致研究的出新。作者深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研究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在这种学术研究和理论旨趣的逐步转向中,作者能够达到对张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从而实现对其现代化实践的超越性认识。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张謇是中国现代化的前驱,同时又是一位早期现代化实践中“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可以说,张謇现代化实践本身,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缩影。因此,就张謇及其事业发言,成了作者的强烈愿望,并导致作者的理论创新。

二

《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对张謇现代化实践失败教训的研究,验证了现代化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也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把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有效避免现代化发展中的陷阱,成功地推进本国和本地区的现代化。这使得该研究具有超越特定人物和时空的普遍意义。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一些带规律性的启示。

1. 超越乌托邦主义,是走出早期现代化陷阱的关键

挣脱中世纪绳索,是早期现代化开拓者最大追求。但是,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和双面性,尤其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加剧,使现代化的开拓者们甚为茫然。摆脱中世纪以后的理想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实践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依据去准确地定位,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恰恰使他们对未来社会的预设,带上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意大利当代著名社会学家G. 德朗蒂指出,“在现代早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当中,乌托邦是一项强大的主题,折射出那个时期的

一种信念,即人类的意志在知识的指引下,可以塑造出社会现实和一种理想的政体。”^{[1](P34)}在欧洲,从托马斯·莫尔开始,他的《乌托邦》可以视为有关现代社会政策的一项空想计划,也可以视为对中世纪的决裂和有关现代社会的最初的反思之一。后来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都展示了现代早期的乌托邦追求。现代早期的乌托邦都相信社会就是由一群政治精英管制的,有时是由一群技术专家精英来管制。在这些早期的作品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范畴的自治性,将社会范畴化约为政治范畴。“由于乌托邦与极权主义和社会工程颇有牵连,已经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概念;但在现代早期乌托邦兴起之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主导意识形态却依然是基督教,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早期的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观念,不如说是处在衰落之中的中世纪制度的一种体现。”^{[1](P34)}正是这样的认识,导致欧洲人对早期现代化中乌托邦主义的超越,成功地挣脱了中世纪的羁绊,推进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全方位的变迁。

作者的论证说明,就像早期西方的现代化开拓者无法避免乌托邦主义一样,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们同样很难避免,而且在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态上,也有着明显的共同点。西方现代乌托邦主义是处在衰落之中的中世纪制度的一种体现,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张謇的现代社会理想也没有走出封建主义的价值阴影。其现代性社会价值定位“直追三代”,他的现代化价值理想以“三代之隆规”为图景。在他的社会价值理想中,首先有一个尧舜式圣王的境界(张謇的整个现代化思路便是圣贤式现代化的思路)。甲午、乙未年间,他“目击朝政日坏”,便“遁居江海,自营其事”,他是把南通作为小国家来治理,而自己则努力领悟三代圣王的治国精义,企求缔造一个具“三代盛世”理想的南通。其次,这是一个王道的社会,力求在南通形成一个如三代式的王道昭明、惠泽小民、规明矩正、教化百姓、万邦协和、国泰民安的升平之世。再次,这是一个“富而教之”的社会,他在南通办教育,以期“子弟绳绳”,为此必须办实业,办实业乃“营志”不“营利”,造成“公款公产公积。民有衣食,乃知礼义,民知有礼,庶可言教,故次礼教”。抱着这种价值框架他赴日本考察,

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景象正是唐虞三代盛世再现的现实模型,日本政府所效法的正是中国的古圣王之道,“宁非吾中国所当取法者乎?”

但是,以三代圣王之道来解释现代化社会理想,难免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把这种社会理想付诸社会实验,虽可灿烂于一时,但终究没有根基而将陷于困境。他理解日本为圣王之道加“机器之学”,实在是一大误解。他把自己在南通的经营暗自喻为“舜耕于历山”,亲撰“垦牧乡歌”谓“崧郁起兮垦牧之乡,我田我稼,我牛我羊。我有子弟,亦耒亦耜,而冠而裳。僮万兮进井里,百年兮洪荒。谁其辟者南通张”。可当时有人就称张謇为“南通土皇帝”。张謇比康有为实际得多,他不希冀没有私有制的“大同”,但他幻想王道浸润的南通,是一个“仁义附焉”的少数富人施惠于穷人而形成公平互爱的社会。但是,后来的事实使他极为失望,正是这些富人把大生集团掏空。他把南通区域发展视为一个封闭环境中的“村落式”实验,在经济、文化、社会交往方面实行封闭式运营。张謇并非不懂开放的道理,但他的社会理想只能像呵护温室中的植物一样去做封闭式实验。钱以振1920年去南通参观后发现,“各项事业兼程并进,唯境外交通置之后图。……全国无论如何鼎沸而南通则自养其兵,自教育其子弟发挥其实业”。这点出了南通模式的重大弱点:封闭性。乌托邦的理想有时在封闭式试验中常常光彩一时,但一旦发生实质性的环境交流(也是无可避免的交流),失败便成必然。

作者的研究同时指出,西方早期现代乌托邦主义提倡精英管制,在张謇则体现为以他为核心的“绅治”。在张謇这里,现代化事业的首要依靠力量是尧舜式的圣贤。他的整个现代化思路就是“圣君贤相搞现代化”的思路。他在没有发现这种圣君贤相时,就把自己在“江海一隅”定位为现代化的圣贤,不仅自喻,而且自警自励,犹如耕于历山的舜。他自己认为,“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时论有不少人认为南通模式有不可模仿性,就因为不能处处皆有一个“张謇”。这也正是南通模式缺乏根基之所在。

在国家统摄社会的传统中国搞现代化,固然离不开国家力量。但现代化中的国家只能是一个

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政治工具。我们并不期望张謇有这样的国家观念,但他始终抱“政府父兄”的意识,以“以道抗势”和“以道附势”交相为用,使自己的事业成为国家事业的延伸,使自己的力量成为国家力量的延伸。

张謇倡自治,但坚持村落主义的说明模式,以利用乡绅的力量。他尊重西方的商务人才及其商务活动,批评过中国的“商末”意识,但他理解中的“商”,绝非市民社会成员,而是绅,是以儒为本的商,是绅商合一。他持“民之分层论”和“天赋之阶级论”,认为绅商合一的绅会以达则兼济天下的方式使南通民生得以共享丰厚,这实在是一个王道式的现代空想。

张謇的现代化推进力量,是传统社会力量的组合。如果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力量未必不是一度可以利用的力量,但如果视之为至上模式,而没有合理制度创新为最终保证,势必出现这样的情况:传统力量同时又是传统方式的利益追求者,他们会把这个“新新世界雏型”掏空。南通事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掏空”。

作者在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张謇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空想性质决定的。这种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可能会在现实中昙花一现,但最终不可能成为社会现实。乌托邦主义是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思想陷阱,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必须超越早期现代化中的乌托邦主义。

2. 走出“中世纪马厩”,必须实现“体”和“用”的双重突破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张謇的现代化实践正是处在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基本思想是一致的。”^{[21](P3)}“中体西用”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即本体论的二元论,其中通行的一对概念范畴是“道”与“器”,或是“体”与“用”。然而,把传统经学(封建的礼为核心)作为“体”、把现代西方科技、大工业生产力甚至一些制度形式作为“用”,是把两种不能互为表里的东西强行统一在一起。如

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开拓者们就陷入了列文森所说的一种文化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3](P327)}于是,就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人格的分裂和二元化,也直接导致了现代化实践中无可调和的矛盾性。作者进而揭示,把欧美的器用形制和唐虞三代式的伦理社会相嫁接,构成南通“新新世界雏型”的实践目标设计,以及其中结构性悖论和制度理性的缺失,是导致张謇现代化实践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而深层的原因是张謇文化人格中的“体”、“用”分裂。

张謇社会价值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并不说明张謇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者。作者认为张謇更是一个务实精进的实践家,而这正是他不同于其他早期现代化追求者的卓越之处。张謇凭着通海人特有的精明、务实和韧劲,踏踏实实地去做。正因为如此,在他的手中才捧出了一个“新新世界雏型”。这个“新新世界雏型”的实践目标构架,主要包括:一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建立以棉纺织为主体,包括冶铁、供电、磨面、榨油、罐头以及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企业的“棉铁主义”的工业体系;二是以通海垦牧公司为起点,建立淮海垦植为主体,包括20余个垦殖公司和农会、水利会、棉业实验场、天生果园等的棉农事业;三是以通州师范为核心,建立以师范教育为主体,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工学校以及幼稚园、教育馆等的教育机构和教育体系;四是以南通地方社会福利为中心内容的各类事业,包括医院、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公园、残废园、育婴堂、养老院、警察传习所、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栖留所和模范监狱等;五是建立地方自治制度,由乡里绅士咨议政事。“新新世界雏型”奠定了张謇及南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崇高地位。

尽管张謇在南通“新新世界”设计中极力利用西方器用成就,但说到底这仍是一个圣贤领导、人人效力的王道小社会,也是一个“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安居乐业的“新农村”。他以王道而主张“村落主义”;他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持棉铁主义,并由此来理解实业;他以“富而教之”来理解教育;以“幼幼老老”来理解社会福利事业;以民本主义来说明民主;以绅治来理解自治;以家族制来设计管理。他所构筑的“新新世界雏型”的一切“法”,就像面对克拉普斯提斯之床的

各色行人一样都要纳入他的“道”。他以为这是一个完美和谐的设计,其实这“法”和“道”根本不能两立。悖论和危机由此产生,器用层面上的推进越是展开,其矛盾和冲突便越趋尖锐。

张謇的“道”“法”相悖,尤其反映在理性制度设计的缺失。西方器用赖以在社会中生存的条件是理性制度。张謇的社会价值理想封杀了这种理性制度的出生。他的大生企业经营与管理陷于韦伯所说的“家务”陷阱之中,他的垦植公司实际倒退到佃农制,他的教育持“政府父兄、学生弟子”的规范设计。这使他的“新新世界”里的各项事业,徒有辉煌之表,不久便危机迭起。

走出“中世纪的马厩”,必须实现“体”和“用”的双重突破,“体”和“用”必须在现代的意义完全达到统一,这是至关重要的。

3. 有效推进现代化,必须用科学理性驾驭伦理激情

现代性包含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历史进步主义四个基本要素。而在这些现代性事物中,渗透着一种普遍化的合理性精神。市场规则、民主程序设计、科学方法论和历史进步日程,都在这种合理性精神中获得说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升华。如果说现代性有一种哲学,那么,这种合理性精神就是现代性的哲学。韦伯在回答著名的“韦伯问题”——“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在西方而不是别处?”时,认为中心因素是由于新教运动而得到扩张化、系统化和普及的理性主义精神(“工具上合理性的行动和价值上合理性的行动”),其集中表现是经济理性主义精神(在富兰克林那里曾简单而俗语式地表现为“钱能生钱”),而其外在则衍化为科学主义、工业主义、民主主义、市场主义。我们十分清楚,这种合理性精神中包含着把人变为“零件”、“经济原子”、“技术数据”,使人物化的危机,而人的物化无疑使人类非常难堪。但是,就像“天堂”之前的“炼狱”一样,现代性事件的出生、现代化进程,无法回避这种合理性精神的普及,每个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人都无法回避与这种理性主义精神、这种合理性原则的遭遇。

而现代发展哲学则沿着韦伯的思路,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现代化进程的合理展开问题,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既是科学技术的飞跃过程、工业生产力发展过程、现代民主政治的发育过程、现代教育

文化建构过程,也是技术理性的展开过程。技术理性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中,成了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从宏观上表现为现代化模式的合理确定、现代化目标的合理时序安排、达到现代化目的具体途径的合理选择,而且从微观上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制度和管理手段运用、现代化发展动力的合理调动,等等。各国在启动现代化进程中的无数事实说明,忽视技术合理性,或者难以启动现代化,或者启动了也会中途夭折。^{[4](P93-142, P191-204)}

在《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中,作者从各方面揭示,对于西方(包括日本、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合理性精神,张謇的敏感性远远低于对西方物质器物的现代化的敏感性。比如,张謇认为:“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5](P37)}这说明张謇已经认识到工业和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但是,他对工业和科学的理解也是在初级本质的层次上:工业就是大机器生产,科技就是物质技能。他并没有看到,“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他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的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6](P35-36)}可以说,张謇对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特征——“严格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簿记制度”、“数字化管理”是很迟钝的。

张謇发起南通事业,起步时极为艰难,所以其推进方式为“先求稳固”、“步步为营”。但是,这种推进方式建立在经世济民、戒慎恐惧的圣贤式心态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合理性利益计算、“数字化”理性的根基之上。传统类型力量配置的官绅联手操作现代化,是不可能建立只有生成于市民社会之中的这种“数字化”理性的根基,因而,其推进方式的选择主要来源于伦理激励。他在伦理激励下展开他的现代化事业。单纯的伦理激励导致他的激进主义,导致他最终选择了“一揽子”、“突进型”地推进现代化的方式。当南通事业的

局面刚刚打开,初见成效时,为使三代盛世式的现代化“新新世界”尽快成熟并示范全国,张謇以跃进式的心态实行“两个扩张”:一是以大生一厂为原点的纱厂扩张,以纱厂为中心的企业多头扩张,以纺织工业为基础的垦植业扩张;二是大量挪用大生企业的资金扩张南通各类社会事业,实行经济社会教育事业“一揽子”推进。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建立了许多个开创性的事业,留下了许多个“全国第一”。但是,伦理激励下的官绅联手操作的现代化实践,到头来终因根基松动而倾覆。

20世纪依靠官绅力量、国家力量推进现代化的事例中,通过伦理动员企求跃进式的发展,而致功亏一篑者不在少数,张謇及其南通事业可算较早的一例。因为在这种推进战略中,本来就包含着传统目标与现代器用、激情式追求和工具手段匮乏之间的悖论,所以,自实行“两个扩张”之后,大生企业集团迅速被掏空,跌入巨额亏损,从此由盛而衰。在张謇这里,总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的矛盾:一是“本小事大”的矛盾,二是“营利营志”的冲突,三是“任重能浅”的窘迫,四是“济民劳民”的两难。没有现代合理性根基,就无法解决这四个矛盾。沉重的债务、混乱的秩序、离散的人心,凡此种种,瓦解了南通这份“新新世界”事业。

总结历史的教训,作者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张謇留于后人警示的是,伦理力量可以是现代化的动员因素,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超越伦理、超越传统的合理性过程,对伦理关系的过度依赖必定带来制度理性的缺失。伦理动员有时能造就一番事业,但过度的伦理动员必定中断现代化进程。要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必须用科学理性驾驭伦理激情。这一结论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三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对死者的适当纪念是知道他们生时做了什么,知道他们有什么作为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是关于他们的生活的历史,不是关于他们的死亡的历史”。^{[7](P69)}只有当代人的生活旨趣才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过去的历史。以往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无形式的、不连贯的、无意义的”宝藏,它们只有在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下,才会再度发言。以往的历史事实即使已经进入了

历史,也会由于失去当代人的关注而成为死的历史,即编年史。因此,历史应当是一个不断改革、不断丰富、不断深入的过程。“历史当然是一切都应改革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力图使自己变完善,就是说,它在丰富自己和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7](P31)}

读《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我们听到了作者与历史——张謇及其“新新世界”的富有哲理的对话。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征程中,张謇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是一个公认的英雄。但是,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环境的恶劣,以及主体自身的传统文化包袱过重,张謇又不得不扮演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正如胡适所说:张謇是一位“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8](P5)}作者着重研究了张謇的“很伟大的失败”,用她自己的话说,“对于执著追求着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张謇成功的经验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謇失败的教训同样是无价之宝。甚至,后者显得更为宝贵。因为,虽然斗转星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正是张謇的现代化事业的继续,而由于某种共同的原因,张謇当年进行现代化实践中的败笔,至今仍应为现代化的实践者时时提防。”这就告诉

我们,作者写这本书,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正是这种“当代史”的需要,要求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历史再度发言。这就是“以史为鉴”,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使历史成为“真历史”,成为有价值的历史;使今天成为历史的延伸和升华,实现历史价值的超越。换言之,就是要使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在扬弃历史现代化的进程中,健康地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 [1] 布赖恩·特纳编. 社会理论指南[C]. 李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 罗荣渠. 从西化到现代化[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3] 杜维明. 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A]. 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C]. 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
- [4] 孙立平等. 国外发展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5] 张謇全集·第1卷[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6]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7]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8] 胡适.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A]. 张孝若.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4.

Comment on *A Great Tragic Hero: A Study of Zhang Jian and Early Modernization of Nantong*

ZHANG Xiangfeng, TANG Lix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China, Zhang Jian was a great pioneer and a generally acknowledged hero. But, as China's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was abominable, and because he was overburdened with his traditional culture, Zhang Jian became a tragic historical personage. Reading and commenting on *A Great Tragic Hero: A Study of Zhang Jian and Early Modernization of Nantong*, we can find that the author's main intention is to make effort to solve the new problems cropping up in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Zhang Jian, early modernization drive, Nantong

(责任编辑:藏 峪)